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15冊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下）

黃雅淳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下)／黃雅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6+20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15 冊)

ISBN：978-986-322-025-1 (精裝)

1. 魏晉南北朝哲學 2. 知識分子

030.8

101015380

ISBN-978-986-322-025-1



9 789863 22025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322-025-1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 (下)

作 者 黃雅淳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 (精裝) 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魏晉士人之悲情意識研究（下）

黃雅淳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悲情意識的研究意義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一、魏晉文化學的闡釋	4
二、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6
第二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文化淵源（上）	13
第一節 天道觀與悲情意識	14
一、生命悲情	17
（一）惜時傷逝	17
（二）憂生畏死	20
二、自然悲情	24
（一）悲秋主題	24
（二）傷春主題	28
三、歷史之悲	30
（一）亡國之哀	30
（二）盛世之憂	32
第二節 儒家思想與悲情意識	34
一、君棄之怨	36
二、思鄉之愁	39
第三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文化淵源（下） —	
一 屈原與悲情意識	43
第一節 屈原與「士」人格的建立	43
第二節 屈原「忠奸之爭」的政治悲情	49
第三節 屈原悲情意識的呈現方式	52
一、美人不得之苦	53
二、爲君所棄之怨	55
三、歸鄉不能之哀	57
第四節 屈原悲情意識的文化意義	60
第五節 魏晉士人對屈原的解讀及其意義	64
一、視屈原爲「以才立身」之士人代表	64
二、引屈原之「任情率性」「狷介直行」爲同調	66

第四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形成之內緣外因	69
第一節 天下多故——政治因素	70
一、政治環境	70
(一) 英主絕少	71
(二) 政風敗壞	72
(三) 屠殺成風	77
二、戰亂相尋	82
(一) 漢魏之際——群雄征戰	82
(二) 魏晉之際——奪權之爭	85
(三) 晉宋之際——內外交戰	86
第二節 人倫衰朽——社會因素	89
一、天災人禍頻仍	90
(一) 災疫流行	90
(二) 民生凋敝	94
二、政教中心破壞	95
三、禮法變質敗壞	97
(一) 競尚奢靡	98
(二) 淫佚荒誕	101
(三) 名教淪落	102
第三節 人心思變——學術因素	104
一、儒學變質	105
二、人性覺醒	109
(一) 思想的新舊衝突	110
(二) 文士心靈的重負	112
三、玄風煽起	115
(一) 玄學的興起	115
(二) 玄學的發展	117
(三) 自然與名教的衝突	119
第五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基調	141
第一節 悲情意識表現的主題	141
一、與天地獨往來	141
(一) 人生的自我觀照	142
(二) 人生無常的孤哀	147
二、易代亂世之憂	154
(一) 身處險世之憂懼	154

(二) 亡國入仕的孤苦	158
(三) 念亂憂生之悲憤	161
(四) 動盪歲月的飄零	164
第二節 悲情意識表現的意象	170
一、飛鳥失群，罹網之懼	170
二、孤臣棄婦，幽怨傷別	178
三、遊子遷流，思鄉念故	183
下 冊	
第六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一）	
——曹植的飄泊轉蓬	189
第一節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	
——曹植一生的悲劇	190
第二節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	
——曹植悲情的形成	197
一、思想性情與曹氏集團的政風不合	197
二、與曹丕的爭立太子	201
第三節 曹植的政治抱負與人格追求	203
一、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	
——曹植的政治抱負	203
二、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曹植的人格追求	204
第七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二）	
——嵇康的幽憤孤哀	209
第一節 家世與精神追求	209
一、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嵇康的身世	209
二、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的精神追求	213
第二節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的性格	218
第三節 嵇康的幽憤孤哀	222
一、輾轉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理想與現實的割裂	222
(一) 自然與名教的執著對立	222
(二) 人間與仙境的雙雙失落	225
二、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	
——情感與理智的衝突	228

第四節	玄學人生觀的悲情本質	232
第八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三）	
——	阮籍的苦悶沈憂	237
第一節	家世與思想追求	237
一、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	
——	阮籍的家世	237
二、	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並流	
——	阮籍的思想追求	240
第二節	「至性過人，與物無傷」的壓抑性格	242
第三節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	《詠懷》中的苦悶沈憂	246
一、	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	曹魏敗亡的感慨	248
二、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	
——	易代之際的憂憤	255
三、	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	
——	身與願違的掙扎	262
第四節	嵇、阮共同的悲情	267
第九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形態（四）	
——	陶潛之遠累避禍	271
第一節	陶潛的平生境遇與人生態度	272
一、	少時壯且厲，委懷在琴書——少壯時期	272
二、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遊宦時期	274
三、	守拙歸園田，叩門拙言辭——歸隱時期	276
第二節	陶潛之悲情	280
一、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一心處兩端）	
——	仕與隱的掙扎	281
二、	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	
——	貧困煎熬與時運相逼	286
三、	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	易代之際的人事感傷	291
第十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消解	301
第一節	遺物棄鄙累，逍遙游太和——遊仙	301
一、	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曹植	304
二、	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縱——嵇康、	
阮籍		308

三、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郭璞	312
第二節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田園山水	317
一、自然山水意識的覺醒	319
二、隱逸與山水田園合流	324
（一）西晉以前，以隱避禍	326
（二）西晉之隱，俯仰山水	327
（三）東晉之隱，悠遊吟詠	330
三、山水清音的怡情解憂	331
第三節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縱酒	337
一、建安之醉，以樂解憂	337
二、竹林之飲，以醉避禍	339
三、陶潛之酣，詩酒自娛	343
第四節 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文藝	346
一、「發憤以抒情」的理論緣起	347
二、「長歌當哭」至「蚌病成珠」	350
三、音樂的怡志養神之效	353
第十一章 結 論	357
第一節 悲情意識的正面價值	358
一、困境中的反思覺醒	358
二、生命意識的選擇	360
第二節 探索魏晉士人悲情意識的時代意義	361
附 錄	365
附錄一：魏晉大事年表及學術年表	365
附錄二：魏晉士人生卒年及卒因簡表	368
主要參考書目	373
後 記	389
附 表	
附表一：魏晉時期昏君一覽表	71
附表二：魏晉時期大屠殺簡表	77
附表三：東晉北伐表	87
附表四：漢末至兩晉災疫簡表	90

第六章 魏晉士人悲情意識之呈現(一) ——曹植的飄泊轉蓬

長久以來，文學作品被視為一面鏡子，反映了當代的社會現實與歷史事件。然而，如此只看到作品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卻忽略了創造作品的主體——一人。同時也忽略了文學自身最為重要的內容——作家的感性衝動與激情。正如學者蔣述卓所言：

文學的本體，最終只能到人——真實的具有極豐富的感性力量和生命衝動力的人當中去尋找。〔註1〕

本文從魏晉時期的眾多優秀詩人中選擇了曹植、阮籍、嵇康和陶淵明四位作為論述的重點。因為曹、嵇、阮、陶諸位較之其他詩人更富於典型意義。〔註2〕曹、嵇、阮、陶諸人，皆深懷儒學的濟世思想，真切地關心現實政治。在青年時代，他們均有建功立業的理想，雖歷經挫折，對世事也未忘懷。其中，曹植所處的時代承接建安，身為王室宗親，對用世從政始終懷有天真而熱忱的期待，其政治情結至死不解。生活在天下多故的魏晉之際的嵇康、阮籍，一方面通過

〔註1〕 見蔣述卓《從文學本體出發看中國文學的發展》，《新華文摘》1987年第十期。

〔註2〕 黃節先生在《阮步兵詠懷詩注·自序》中嘗言：「(鮑)參軍沈抑藩府，(謝)康樂未忘華胄，其詩雖工，其於感發人心，不若嗣宗為至。」在此期詩人的人生悲劇中，這兩類詩人儘管殊途同歸，但其人格詩品，卻頗有高下。《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作者心靈情感抒發的同時，也展現了他的胸襟懷抱。同樣是人生的悲歌，在不同的詩人作品中，涵蓋的思想、社會內容則有高卑深淺之別。故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質性〉中言：「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而曹、嵇、阮、陶等詩人，他們的文品及人品均有「屈賈之志」的堅持，故具有典型意義。

嵇康那種對司馬氏的大膽反抗和不合作態度中顯露出的忠臣烈士之節，依稀保留了曹植時代知識份子的政治熱情與鋒芒；另一方面，又通過阮籍那種遺落世事，飲酒放誕的處世方式，顯示了這一時期以及往後歲月裏，知識份子因受到挫折而扭曲的政治激情，和他們對現實政治更為成熟的冷靜態度。到晉宋間的陶淵明，在關心世亂的同時，對政治生活採取了完全退隱的方式。他們在內心始終執著於對人生志業的追求，從汲汲用世到反抗現實，再從佯狂放誕到退隱躬耕，此四位的生命情調呈現了魏晉士人對待現實人生的變化過程。他們苦苦掙扎於其間，但終無計擺脫政治和人生的悲劇。曹植抑鬱而終；嵇康反抗而亡；阮藉放蕩自晦，仍未能逃脫統治者有形或無形的迫害之網；只有陶淵明，算是從主觀到客觀都實現了某種超越，然而，他為這種超越所付出的痛苦代價也非比尋常。

由於魏晉社會中，充滿了嵇康所感慨的「大道慙不舒」或陶淵明所深嘆的「真風告退，大偽斯興」式的道德淪喪和理想幻滅。對這些真誠的詩人而言，不堪的是，他們不僅親眼目睹了那些不肖之徒，假傳統道德之名，行貪縱放蕩之實，在根本上背棄君父大節、綱常名教，卻盡量的藻飾虛禮，用「綜覈名實」手段打擊對手。而他們自己或因厭惡權勢者標榜禮教、陰行詐術的虛偽行徑；或為避免政治迫害而晦跡韜光，甚且不得不親手埋葬一些夙昔的人生理想，並採納某些違心的行為方式，混跡老莊、越禮任誕。作為知識份子中出類拔萃者的曹、嵇、阮、陶等士人，在易代之際因理想破滅而感受到的內心痛苦與煎熬是非常深刻的。以下四章乃分別論之。本章先從曹植飄泊轉蓬的悲情論起。

第一節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曹植一生的悲劇

充滿入世精神的傳統儒學強調知識份子的用世進取，從先秦到兩漢的儒者，都心無旁騖地致力於通經術、立功名，以實現其人生的價值。由於早期「道尊於勢」的遺風猶存，當時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當崇高，心態較為平衡。對宇宙、社會與人生的關係，不遑多加思慮。東漢以來，知識份子的社會使命感和獨立人格意識急劇發展，積極參與政治與追求個人精神自由這兩方面的渴望，變得日益強烈。然而，東漢以降，世道陵夷，社會動亂，

統治者在思想與政治方面對士大夫的箝制打擊日見嚴厲，威脅到知識份子的現實生存。而社會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的新舊變化，也嚴重衝擊到對士人的原有追求。尤其如曹植這類思想真誠的詩人，處世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其理想主義精神與他們一如往昔的渴求用世之志相互交織，往往令他們在現實政治中涉入極深而苦惱極重；而他們對儒家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看重，又使他們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巨大擾動面前，陷於人生哲學的困惑與矛盾。而此種矛盾與困惑就在其後發展為玄學中對自然名教關係的思索，並引導一些士人開始在原有正統哲學之外去尋求答案與解脫。但在曹植生活的魏漢之際，哲學思想上尚沒有一套完整成熟的，可替代傳統價值系統的玄學理論來使像他這樣的知識份子解脫自慰，而他又偏具有執著的理想追求和近於楚《騷》的氣質個性，加上人生遭遇的不幸，種種因素，導致曹植在思想上長期處於新與舊、理想與現實衝突的狀態。精神上的徘徊追尋，情感上的迷網抑鬱，均通過詩作來抒發表現，此當是我們了解其悲情人生的總契紐。

曹植在青年時代，一度有被立為嗣子的可能和建功用世的機會。《三國志》本傳載：

（植）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

曹植天資盛藻，魏武好文，故特蒙欣賞；同時曹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三國志》本傳），亦有類其父不喜虛矯，「佻易無威重」的風格。為此，曹操頗覺「是兒類我」，有重用之意。雖然已立曹丕為世子，五官中郎將，但曹操卻在建安十九年出征孫權時，特意安排曹植鎮守鄴城。按曹魏制度，這一責任通常只有身為儲貳的世子才能承擔。以往曹操數次出征，也都是用世子曹丕鎮鄴，臨時處理國中的緊要事務。故從此次曹操臨行前的一番安排，可以看出其用心與期待。這是曹植一生在政治最被重視的時期，也是他實現理想的機會。然而很快曹操即對曹植失望。從表面看來是因「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建安二十二年，曹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以致「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見《三國志》本傳）蓋曹操一向以陰謀權術待人，亦隨時提防他人以己之道，治己之身，故治國法度森然，對諸子也約束極嚴。

司馬門爲王官外門，舊制除天子外嚴禁在此馳騁馬車。昔漢文帝時，太子曾與梁王共車入朝，過司馬門而不下車，遂被公車令張釋之劾爲「不敬」。所以曹植的私開司馬門行馳道中的大膽之舉，不僅是公然違反了曹操的嚴規和一向的法度，其中還牽涉及僭擬天子儀制之罪。故曹操爲之震怒，從此對諸子更嚴加防範，有事出征，必攜子同行，防備他們再有越軌行爲。

由於曹植在其父心中地位的明顯下降，於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正式立爲太子。儘管如此，到建安二十四年，蜀將關羽圍攻駐襄樊的魏將曹仁，曹操還是欲以曹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去救曹仁，並準備召見曹植予以誡敕。雖然有此緩和父子關係並可望立功的機會，可是曹植卻因被曹丕灌醉而不能前去聽敕受命。曹操再次發怒，悔而罷之。

曹植雖在政治上失勢，但只要曹操在世，總存在復被起用的可能，其生命的安全也能得到庇護。而自曹操在延康元年病逝之後，曹植便不再能受朝廷的寬容。此時他二十九歲，從此結束了在鄴城的公子生活，開始了人生的痛苦經歷。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受漢禪登位，是年冬，即遣諸弟就國。〔註3〕對曹植而言，被迫離開自幼習居的舊都鄴城去臨菑，情感上是非常痛苦的，何況在極堂皇的「就藩」理由下，隱含了極深的屈辱和悲哀。他內心骨肉分離的傷痛，在〈聖皇篇〉中，有委婉的表達：

祖道魏東門，淚下沾冠纓。扳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日將暮，

何日還闕庭？車輪爲徘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在此之前，友人丁氏兄弟已被曹丕治罪殺死，此次曹植的離鄴，亦成爲對他迫害的一個開端。第二年，在臨菑的「監國使者」灌均，秉承文帝的旨意，奏「臨滋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因此罪名，曹植幾至被殺，由於太后的力請，文帝才先貶曹植爲安鄉侯，再改鄧城侯。曹植在鄧城不久，又因「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註4〕被東郡太守王機和防輔吏倉輯等誣陷。「機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以紛若」。

〔註5〕曹植遂再次得罪，到黃初三年，始封鄧城王。當時曹氏諸王地位極其低

〔註3〕曹植〈聖皇篇〉記此事云：「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藩位任自重，舊章咸率由。」按史載，是年11月始「復三公」，則曹植離鄴，必在11月後。

〔註4〕同上註，《曹集詮評》卷八〈黃初六年令〉，頁128。

〔註5〕同上註。

下，《通鑑》魏文帝黃初三年載：

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

而文帝對曹植又視爲待罪之臣格外加以折辱，在諸侯王皆爲郡王時，僅封曹植爲縣王，食邑減至二千五百戶，爲原建安時臨菑侯食邑的四分之一。黃初四年，曹植徙封雍丘，同時獲准在當年夏天入朝覲見。天真任性的曹植又因此險些罹禍，史載：

初，植未到官，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鎖，徒跣詣闕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之不樂。詔乃聽復王服。（《三國志》本傳注引《魏略》）

曹植爲此一再上疏自責。更令曹植深慟的是，在京城期間，兄弟中〔註6〕與他友誼之情最篤的任城王彰暴疾身亡，或云是被文帝毒死；〔註7〕初秋諸王歸藩，有司又借口「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不許曹植與司馬王彪同路而歸。有感於同根手足「一形往不歸」而至親骨肉「離別永無會」，曹植作了淒愴悲婉的〈贈白馬王彪〉七章，如：

踟躕亦可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靈兮。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人悲。（其五）

曹植懷著悲苦的心情所見到的每個景物：寒蟬淒切、白日西匿、飛鳥投林，

〔註6〕黃節注《曹子建詩集》中引《魏志》云：「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孫姬生楚王彪。」

〔註7〕《世說新語·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並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避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95）

孤獸索群，無不是藉景抒發心中難堪之情。想起任城王的暴死，悲傷難已；回顧自身，也是朝不保夕。與任城王死別、與白馬王生離，人生之無常無奈，真誠深情如曹植者，怎能不憤懣哀傷？而終文帝之世，曹植遂不再有入朝京師，母子兄弟相見的機會。

曹植情志所鍾，原在建功立業，雖屢遭罰黜，仍天真地以為立功是自己贖罪的最好方式。直到黃初四年獲譴後，他在上文帝的〈責躬詩〉中，還極力陳請：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厘，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戾。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

心之云慕，愴矣失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他立功贖罪之心雖切，卻不知出征領兵，本具政治上的利害關係，苟若立功而增加聲望，更為乃兄所不樂見，此種願望與請求，適足以增加文帝的猜忌與嫉恨而已。

一再求用而不遂，或許使曹植也終於對個中原委有所悟覺，於是他在黃初五年連上三表，將以前魏武賜與的鎧甲、銀鞍及自己所飼的駿馬全部交給朝廷。從表面看，此姿態只是表明其安於閒居之心，實際上則是欲以獻馬、鞍、甲等物來求得免於猜忌和迫害。〔註8〕也許，曹植此舉真使其兄感到略為放心。黃初六年，文帝東征途中，遂過雍丘宮與曹植相見，又給他增戶五百以示優待。這時曹植又開始夢想能蒙文帝諒宥，可再去「修吾往業，守吾初志」。〔註9〕但甫及一年，文帝在洛陽病歿，其子明帝即位。

太和元年，曹植名義上徙封浚儀，二年，又還封雍丘，到太和三年年底，又被改封到較為富庶但離京更遠的東阿。這幾次徙封，不僅隱隱可見朝廷對他的猜疑之心依然未消，還透露出了明帝對曹植生活上雖可略加優待，但卻決不願他參與政事的基本態度。

在曹植的心中，其固有的政治熱情卻因處境的稍有改善而重新燃起。太和年間，他一再上表求用，指陳將略，議論朝政，對國事表示了極大的關心。

〔註8〕周一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對《宋書·劉義慶傳》所載「世路艱難」，「不復跨馬」事申論以為，當時「騎馬一事在某種程度上竟成政治野心之表現」；「劉義慶唯恐政治上遭猜忌，不敢復跨馬馳騁，遂轉而招聚文學之士，遊心於著述。」此雖是劉宋朝事，但當日曹植的身分處境，亦與之相類，甚且更加艱難。

〔註9〕同註六。

時值三國鼎立中期，蜀將諸葛亮以攻爲守，屢出祁山，威脅魏之關中；孫吳與之遙相呼應，藉長江天險，據保東南，國勢方盛。曹魏面臨的是東西兩線作戰的形勢，但明帝即位之初，對吳軍事卻頗爲冒險，以致在太和二年，發生了大司馬曹休中周魴僞降之計，兵敗病死之事。素感「抱利器而無所施」（本傳）的曹植，在此壯士立功之秋，作詩表示自己的報國之志：

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其五）

又上〈求自試表〉，陳說自己「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希望能有機會去「乘志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

詩中表明忠於王室、效忠報國的心態。當時朝廷之內，亦隱藏危機。魏室一向不重宗親，所封諸王，毫無拱衛王室，藩屏天子的能力。而異姓之臣，卻已在潛結黨羽，暗懷叵測，一些有遠見的士人，開始深以蕭牆內的「鷹揚之臣」爲憂。曹植爲魏室至親，對此事之關切，尤過於他人。他在此時期所上的〈陳審舉表〉、〈求通親親表〉、〈諫發諸王國內士息表〉等，皆極力闡述宗王屏衛皇室的重要；所作的〈大魏篇〉、〈磐石篇〉、〈豫章篇〉、〈丹霞蔽日行〉等詩篇，也深含扶本培根之義。

然而，明帝對曹植的一系列建言，僅在枝末上有所採納，其餘大者，唯回文答之而已。至太和五年，明帝得子，曹植上疏求存問親戚，朝廷遂同意他在年底入覲，時隔八年，曹植終於重睹宮闕。在京期間，明帝對曹植一再賜食賜物，似乎優渥有加；次年二月，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然而，曹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請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見本傳）。當他意識到自己在朝中的位置，真如當年不幸而言中，是「圈牢之養物」時，內心更爲淒愴：

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圈牢之養物也。……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並滅。（〈求自試表〉）

曹植心系王室，然而一再的失望落空，不斷的遷徙流離，加深了他內心的飄泊無依之感。在〈吁嗟篇〉中，他以轉蓬自喻，表達了自己的流離之苦：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若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我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此詩逼真地描繪出他連年播遷的痛苦感受，也繼承了屈原眷戀故土的情懷。黃節先生注此詩云：〔註10〕

屈原〈卜居〉曰：「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子建此篇，……意蓋本之。

又引丁晏曰：

《魏志·陳思王傳》：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在中國文人的文化意識中，本土觀念強烈，如屈原的〈招魂〉即反映了人們希冀將野外游蕩的魂魄招喚回家的宗教觀念。在空中飄泊的轉蓬離根而逝，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只能隨風飄流。在〈九愁賦〉中，他又以孤客、獨舟、單雁自喻，表現了他的淒苦心境：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渺渺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

他精神極度痛苦，惆悵於自己的處境，悒鬱寡歡。

曹植本博學多才，悟性極高，對老莊之學也素有研習，然而卻未能在當時復受到重視的老莊哲學中尋得解救之方，此乃與其稟賦的氣質有關。他對儒家積極有爲的人生哲學習染甚深，其氣質又多愁善感，故不能在老莊哲學中獲得安慰，反而與他固有努力進取的周孔遺教形成衝突，產生了更大的矛盾與困惑。他最終了解到嚴酷的現實不容許他實現儒家的濟世之志而憂憤；

〔註10〕見《曹子建詩集注》卷二，頁319及《曹集詮評》卷五，頁68。